

管理

Journa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从中国战略到全球战略

(美) 彭维刚

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韦森

从制度理论入手的中国管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刘忠明

国家制度属性：理论与方法 牧野成史

制度理论与企业战略研究 吕源、徐二明

ISBN 978-7-5096-0635-3



9 787509 606353 >

1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略管理/徐二明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096-0635-3

I. 战… II. 徐… III. 企业管理 IV.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326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徐水宏远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申桂萍

技术编辑: 杨国强

责任校对: 超凡

880mm×1230mm/16

9 印张 254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书号: ISBN 978-7-5096-0635-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68022974 邮编: 100836

《战略管理》杂志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

席酉民 西交利物浦大学

主任：

徐二明 中国人民大学

副主任：

陈传明 南京大学

沈志渔 经济管理出版社

李 垣 西安交通大学

仝允桓 清华大学

学术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晓红 中南大学

蔡 莉 吉林大学

陈忠卫 安徽财贸大学

高 闯 辽宁大学

恢光平 南京理工大学

贾建民 香港中文大学

李新春 中山大学

李维安 南开大学

兰海林 华南理工大学

吕 源 香港中文大学

戚聿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项保华 复旦大学

徐 飞 上海交通大学

周小虎 南京理工大学

张承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宗益 重庆大学

《战略管理》杂志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徐二明 中国人民大学

副主编（按姓氏拼音排序）

林丹明 汕头大学
刘力钢 辽宁大学
吕 源 香港中文大学
徐 飞 上海交通大学
杨世伟 经济管理出版社
周小虎 南京理工大学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井润田 成都电子科大管理学院
揭筱文 四川大学管理学院
贾良定 南京大学商学院
李东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 东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宋 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申桂萍 经济管理出版社
王 钦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王智慧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
曾馥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周长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赵顺龙 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映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学院

战略管理

Journa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第 1 卷 第 1 期 2009 年 5 月

Vol. 1 Issue 1 May 2009

目 录

战略管理制度观

- 从中国战略到全球战略 彭维刚 (1)
- 制度理论与企业战略研究 吕 源 徐二明 (14)
- 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韦 森 (23)
- 从制度理论入手的中国管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刘忠明 (41)
- 国家制度属性：理论与方法 牧野成史 (49)
- 国家是重要影响因素吗？制度发展和外国子公司的绩效 陈文娟 (55)
- 国家制度和企业战略 朱 虹 (60)
- 以制度理论为基础的企业战略管理实证研究方法简述 吕 源 (66)

战略研究

- 国外多元化测量方法适于本土研究吗？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 贾良定 鲁 倩 万国光 周婕妤 (85)
- 挂靠管理研究——一个社会网与新制度论的解释 罗家德 孙 瑜 (111)
- 社会网何以使创业成功——关于创业的合法性考察 郭 毅 李芳容 (121)

Contents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Strategy Research Articles

- Perspectives—From China Strategy to Global Strategy Mike W. Peng (1)
-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Strategy Research Yuan Lu, Erming Xu (14)
- North's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From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o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Weisen Li (23)
-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 Chung-ming Lau (41)
- Country as Instituti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Shige Makino (49)
- Which Country Matters?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Affiliate Performance
..... Christine M. Chan (55)
- Institutions and Firm Strategy Susan Zhu (60)
-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Institution-based Study of Firm Strategy Yuan Lu (66)

Research Notes

- Are the Diversification Measures Both Reliable and Valid for Indegenoues Research? Evidence
from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 Liangding Jia, Qian Lu, Guoguang Wan, Jieyu Zhou (85)
- Guakao Research—An Explanation from Social Network and New Institutionalism Approaches
..... Jar-Der Luo, Yu Sun (111)
- How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would Contribute to New Venture Success?
..... Yi Guo, Fangrong Li (121)

【战略管理制度观】

从中国战略到全球战略^①

彭维刚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管理学院, 美国 830688)

【摘要】 本文认为, 虽然中国战略研究和全球战略研究开始时各不相关, 但是现在两者正逐渐融合到一起。推动这种学术转变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崛起, 即中国经济已经从全球经济的配角转变为世界经济的核心贡献者之一。我回顾在我们这一学科中中国研究早期根由, 概述自己如何开始中国研究, 以及讨论我最近将中国和非中国要素结合得更加全球化的研究。此外, 我用正在兴起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研究推动的、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理论 (Institution-based View)^② 来说明中国研究如何跨越目前研究的状况对全球化理论做出更多贡献。最后,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研究走向全球战略研究的核心舞台, 我建议学者们“行动本土化, 思维全球化”。

【关键词】 中国战略; 全球战略; 制度基础理论

中国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学术领域中眷顾的概念和理论是从与中国非常不同的运行系统假设发展而来, 而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但更像一种文明。事实上, 正是这个“系统”概念, 也就是含有因果关系完美搭配或者吻合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变量运用在中国时才需要做很大调整。

——Lucian Pye (1992: 1162)

如何在全球科学研究这个共同体中从事和发表中国研究呢? 中国为争取宝贵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在全球与很多竞争者展开竞争; 同样, 中国研究为了争取顶级期刊, 也不得不与很多非中国研究竞争。有人认为, 中国研究本身就很有趣, 但是中国研究被主要期刊拒绝的比率却很高, 这是因为对编辑和杂志而言, 发表中国研究的机会成本很高, 即会有更多非中国的研究被拒绝。因此, 所有有兴趣从事和发表中国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做到在这竞争激烈的全球思想市场中, 通过发表成果, 对理论做出贡献。

我写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探讨这个“如何做到”的问题。我自己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仍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或模式)。在这里, 希望与诸位分享的是,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这篇文章尽管基本上是基于非常特殊数据的个人案例 (即我自己的经历), 但我确信回顾自己有关中国 (和非中国) 研究演进, 会有助于我们思考更大范围的文献演变, 以及推测将来文献的发展方向。本文的中心论点是, 中国战略研究与全

【作者简介】彭维刚 (Mike W. Peng), 教授,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管理学院, E-mail: mikepeng@utdallas.edu。

① 此文原载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2, 123-141, 2005。

② 译者注: 英文 “Institution-based View” 也译为 “制度基础观”。考虑到 “Resource-based View” 在很多流行的文献中译为 “资源基础理论”, “Institution-based View” 在本文也译为 “制度基础理论”。相应的,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Strategy 则译为 “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理论”。

球战略研究，在开始时各不相关。但是，两者现在正在融合。所以，在努力推动中国研究向前发展时，全球视角是必不可少（Peng, 2006; Tsui et al., 2005）。

在继续讨论之前，首先有必要明确本文中的“战略研究”是一个泛指的定义。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为“战略、组织和国际商务研究”。为了简洁起见，本文还是采用了“战略研究”一词。

一、中国是中国，商务是商务？

毫无疑问，在 20 世纪后半叶，在战略、组织和国际商务领域的现代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研究（主要是美国）（Boyacigiller & Adler, 1991; March, 2005）。直到最近，中国才进入这类研究领域。当然，这不仅是我们学科的问题，而且是影响大部分社会科学的一个问题（Pye, 1992）。过去，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探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过大多归于区域研究之列。例如，*China Quarterly* 是一本优秀刊物，但是没有在“中国研究”领域之外被阅读和引用过。结果是，中国研究被置于主流、以学科为基础的研究之外（Lau, 2002）。即使有的学者在主流期刊上发表中国研究，其文章也通常被忽视或被边缘化。例如，Tung（1981a）发表在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上的文章，根据社会科学论文检索系统（SSCI），到写作本文时为止（2005 年 2 月），Tung（1981a）的文章仅被引用了九次。

当然，社会科学研究并非在真空中进行。我们学科的研究尤其要注重其适宜性。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中国长时期与世界隔绝，以及它在 80 年代有限度地参与全球经济的现象，导致了一种观点（不管正确还是错误的），即中国的研究是不适宜的。Oded Shenkar 教授，既是我的朋友也是同事，告诉我当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计划写关于“中国商务”的博士论文时（他的论文最终在 1981 年完成），他的导师指出：“中国是中国，商务是商务——两者选其一，但不能将两者混在一起！”这种观点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却一直延续到 90 年代。1994 年，当我建议以“中国商务”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时，华盛顿大学的 Charles Hill 教授同样劝说我放弃该计划。我毫不怀疑教授这么做，是出于关心学生的最佳利益。我本人非常感谢 Charles Hill 教授对我有能力从事和完成博士研究充满信心，并且给予我首屈一指的训练。然而，这两条惊人一致的建议竟时隔 15 年（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期），反映了这个学科领域中关于中国研究的“常规的智慧”。

一般地，按照 March（2005：10）的说法，“最有天赋的学者倾向做常规的、范例的、令他们成功有保障的研究”。他接着说：“那些，或者出于选择或者出于必要，参与地域碎片研究的、有才华的个人学者则不知不觉地变成利他主义者，（因为）他们宁愿放弃最明确的机会，为了在学科获得认可而去参与那种为了学科而不是为他们自己但是看起来希望不大的探索性赌博。”因为：
①我是自私的（或者说至少不是 March 描述的利他主义者）；
②我收到了“不要去做”的建议；
③我想两面下注减少损失，所以我决定做非中国研究的论文。该论文应用了交易成本理论、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去探究美国出口中介绩效的决定因素。1996 年，我完成了论文，出版了一本书（Peng, 1998），并发表了三篇论文。我要感谢 Charles Hill 教授，他鼓励我在做学位论文之余，把中国研究作为副业。随着时间的流逝，本来我的导师认为是副业的中国研究，现在已经成为我研究的主流。鼓舞人心的是，不管是学术界还是专业领域，都存在着对中国商务知识的巨大需求。我的工作恰好部分地满足了这种需要。当然，在开始时，我不得不研究两种基本上毫无联系的文献，这些文献之间又没有什么共同点，最初的探索道路是令人烦恼而富有挑战性。回顾过去，作为一名研究生，我要同时处理两个毫无关系的研究项目，迫使我成为一名基础广泛、更有效率的学者，这反而大大提高了我后来的研究能力。

回首往事，我与这个学科有关的研究始于对中国的关注，然后“多元”地融合中东欧（CEE）其他转型经济。“转型经济”一词便出现在我文章的题目中（例如：Peng, 2000）。最近，我进一步

扩展了研究范围，努力探索除了中国和中东欧以外的新兴经济（例如：中国香港地区、韩国和泰国），其结果是我近期的出版物里经常出现“新兴经济”一词（例如：Tan & Peng, 2003）。随着我的研究的国际化，自然开始采用全球战略（Global Strategy）一词形容这些研究，全球战略也是我所著新教科书的书名（Peng, 2006）。总而言之，溯源我自己研究的演变，其模式是从关注中国战略研究转移到更多的全球战略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研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我相信，自己的经历是更大的学科演变的一部分，即从欣赏中国研究到逐步将中国研究融入全球战略研究事业中。

我相信不再把中国研究边缘化，而是把中国研究放在全球战略研究的中心舞台的这种学术转变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十年或者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崛起。随着中国经济从全球经济的配角转变成核心贡献者之一，我们学科内的研究者和期刊已经开始对中国研究更感兴趣。否则，他们就有“落后潮流”的风险。例如：Peng et al. (2001c) 报告说，10 份顶级期刊中与中国相关的文章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22 篇增加到 1990~1997 年的 61 篇。同样，Li 和 Tsui (2002) 发现，在 20 份顶级期刊中，于 1984~1999 年发表的 226 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中的 60% 发表于 20 世纪 90 年代。换言之，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学者，我们遇到了发展事业的大好时机。否则，如果我们试图超前推动中国研究，前面所举的 Tung (1981a) 的例子恰好告诉我们将会面临什么。那么，是什么引导中国研究从前不久的“在错误时间又在错误地点”转变为近期的“在恰当时间又在恰当地点”的呢？接下来的两部分回顾了这一历程，并概述了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二、早期的中国研究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在我们领域里，早期有关中国研究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能把主流理论应用到根本不同的环境中吗？从 Tung (1981a) 到 Shenkar & Glinow (1994) 给出的答案是“怀疑！”发表在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上的一篇关于中国研究的文章（Tan & Litschert, 1994）报告了一个有趣的发现：事实上，西方的战略管理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就期刊编辑要求作者在发表的论文中有理论和实证贡献来说，这些现在看来很原始的发现，在当时却是开辟了新天地。

因为：①我们学科的主流理论都是从西方（主要是美国）企业的经历中发展起来的；②即使在发达经济国家中，美国也很独特，因为国有企业（SOEs）在美国一直最少。因此，早期关注当时中国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国有企业）的中国研究很难发表，即使发表了也很难有影响力，很难被广泛引用。换言之，这个领域中美国的主导地位（Boyacigiller & Adler, 1991；March, 2005）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的中国研究不能进入主流杂志视野。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另外一种主要组织形式（集体企业）在主流理论眼里更是陌生。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研究取得了更多的合法性，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中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举足轻重的企业家增多了。由此应用国际商务理论（Luo & Peng, 1999）和创业理论（Peng, 2001）则变得更容易。这些理论与主流研究者更容易联系起来。此外，国有企业研究本身也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这主要是因为世界其他地方进行了私有化运动，中国却没有进行。从总体上看，全球 GDP 中国有企业的份额从 1979 年的超过 10% 下降到 21 世纪初的大约 5%（Megginson 和 Netter, 2001）。相应的，关于私有化的文献大量增加。但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很快意识到，如果缺乏对国有企业本质的清晰认识，那么，私有化政策可能并不适宜，也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或者，最坏的情况是灾难性的（Peng, Buck & Filatotchev, 2003）。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有关国有企业的研究（Peng, 2000）。换言之，中国虽然没有官方实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只产生了“非正式的私有化”（职业化管理、收购和上市的形式），但由于全球都在关注私有化和国

有企业，有关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也就从中获益了(Tan & Peng, 2003)。

三、我的中国研究的起步

我在上海出生、成长，在1989年去美国读大学之前一直对中国很感兴趣。1991年，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开始攻读战略方向的博士学位之后（我从未获得硕士学位），开始更加系统地寻找进行中国研究的机会。这是一段孤独的经历。部分原因是我搜索到的主流期刊上发表的中国研究很少。在逐一翻阅了我们学科领域的主流期刊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有关中国的研究文章非常之少。整个20世纪80年代，只有九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刊登在六份主流杂志上。十年中，平均每份杂志发表一篇多论文(Peng et al., 2001c: 97-98)。此外，作为一名博士生，我探索中国研究的经历如此孤独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志趣相投老师和同学。虽然我是系里唯一的中国学生，但这种独特对促进我对中国的特殊兴趣并没什么帮助。

真正触动我后来发表多篇中国研究的文章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的冬天。那时，Charles Hill教授讲授的、也是我的第一个战略研讨班刚开始一个星期，我的第一篇阅读材料是Penrose (1959)的《企业成长理论》(*A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西雅图的一月和往常一样，大雨倾盆，Penrose的书（也许还有大雨和Charles Hill的讲座）深深打动了我。据我所知，那时中国成千上万的企业正在迅速发展。很多经济学家在国家层面研究经济发展，但在企业层面研究企业发展的学者却寥寥无几。据我所知，中国企业的成长以前还未研究过。

中国企业如何成长的呢？对我来说，这是个有理论价值的、未经实证检验的、重要的实践问题。当然，没有现成文献指导的研究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尽管Penrose (1959)对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是因为资源基础理论的兴起），但Penrose出版那本书之后的30年中，有关企业成长的Penrose式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和战略领域都不在“安全”主题之列。将Penrose式的思维应用到非主流情境中（例如中国），风险就更大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上了Penrose的理论。回顾往事，现在我相信是“路径依赖”起了作用。大部分人可能对首次约会和阅读印象很深刻。例如，我不再记得第一次战略研讨会上我们谈论的第五个或第六个话题了，但是仍对第一个话题(Penrose)记忆犹新。这也许就是“一见钟情”吧。

尽管最初的兴趣与发现和Penrose有关，但是我很快认识到简单应用Penrose式的思维对我的中国研究来说远远不够。因为，中国毕竟是中国，而Penrose的作品是以西方社会为基础的。为了发展中国企业成长的相关理论，其他的理论工具是必要的。问题是，另外的理论是什么？随着研讨会的进行，Charles Hill每周都引导我们讨论一个新理论，我试图将每个新介绍的理论都应用到还未动笔的学期论文中去。第一周之后，我就决定在学期论文中关注Penrose和中国。除了Penrose，我还对North (1990)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书印象深刻。这是Charles Hill在后来的研讨会上介绍的。同时，我选社会学作为辅修科目，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理论课程。通过这些学习，我的思维开始和制度理论产生强烈共鸣。虽然制度理论在90年代早期才在我们学科领域开始获得合法性，而社会学的制度理论大约10年前就已成型了(DiMaggio & Powell, 1983)。结果，经济学（通过Charles Hill的研讨会）和社会学（通过社会学课程）两方面对制度理论的结合激发了我大约几周的灵感，一直持续到第一季度（1992年1月或2月）。不管其学术根源为何，制度理论为我的中国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基础。

就像大学生做选择题测试一样，我也逐一研究了其他可能的理论。在最主要的理论中，我发现交易成本理论是静态的，资源基础理论不够成熟（当我开始进行博士研究时，Barney (1991)的文章还几乎未出版），种群生态理论是不相关的（考虑到中国政府对企业诞生和死亡的有效控

制)。相比而言，制度理论在解释和预测复杂的动态性方面略胜一筹。例如，预测制度转型和企业反应。大体说来，如果我们要努力增进对诸如中国企业等迅速发展的企业的了解，就必须利用最能帮助我们捕获这些企业的最强大的理论构架。在1992年，我认为制度理论代表了这种好的构架。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仍然这样认为。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制度理论不仅有助于中国研究，而且还有助于推进全球战略研究。所以，我最近努力发展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理论（详见后文“理论贡献”部分）。

回到1992年冬天，在我博士研究第一年的中期，我完成了Charles Hill研讨会的学期论文，这篇论文收到的反馈既有鼓励，又有批评。后来，这些理论思想发表在我的第一篇学术出版文献，即*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Management* (1994)这本研究论文集集中的一章。在博士同学的帮助下，我深入研究这些思想，最终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发表了(Peng & Heath, 1996)。我后继的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的三个案例，并在*Organization Studies*上发表(Peng, 1997)。回首往事，这些论文的探索是个冒险的过程。正如前文提到的，中国研究在90年代早期不被视为主流研究。在缺乏团队支持的情况下，一个博士生做这样的研究是特别容易备受责难的。我独自写作和作为这些论文第一作者的经历反映了一个悲哀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人与我一起研究这些非主流的题目(Peggy Heath是我的博士同学，曾在1996年论文的编辑中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后来却放弃了学位)。对我来说，接受Charles Hill的建议从事非中国研究的学位论文写作，而将中国研究作为副业，也使我为此付出了重要的机会成本。中国研究使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学位论文——这也是现在我建议自己的博士生要避免的问题。作为一名学术创业者（或者，也许我们是冒险的“独行者”），虽然我同意做非中国论文，但我坚持做中国研究。我追随自己的热情，也从中国研究获得了乐趣。

自从毕业以来，我一直想把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最初是扩展到中东欧的其他转型经济体（例如，波兰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和地区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导向的转变。这种研究对象的扩大部分是源于我内心的“帝国主义”情结。作为一名学者，我努力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获得广泛影响。我一直坚信，纯粹的中国研究对除了“中坚核心”的中国学者组成的小圈子以外的学者缺乏吸引力。此外，我对中东欧产生兴趣也是自我保护的需要。我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更加普遍化，编辑和审稿人员就不能说“我们对研究单一国家（除了美国！）的论文不感兴趣”。这样，我的论文便不容易被拒绝。所以，我经常做比较研究，不仅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比较中国和中东欧（以及其他地区）。这些努力最终集成了我的第二本书——*Business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Peng, 2000)，这可能是我们领域第一本明确对比两个主要转型经济地区（中国和中东欧）的商务战略的著作。地区多元化和扩张战略已见成效，我的论文虽然有浓厚的中国要素，但它不仅被中国学者阅读和引用，而且被对其他地区（如中东欧）感兴趣的学者所引用。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作为一名研究生着手中国研究时确实倍感孤独。但是，到了90年代末，我不再有这样的感觉。我担任两个关注亚洲/中国研究的学校（夏威夷大学（1995~1997）和香港中文大学（1997~1998））的教员。事实上，中国研究在90年代末就变得流行了。*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关于新兴经济商务战略的一期特刊吸引了75篇稿件。其中，27%涉及中国这个研究最热的地方(Hoskisson, Eden, Lau & Wright, 2000: 260)。我惊讶地发现，编辑引用的100篇参考文献中有4篇是我的论文(Hoskisson et al., 2000)，我由此成为在参考文献中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毫无疑问，我曾经的副业已经成为我的研究主流。

世纪之交时，我认为不管是挑战还是挫折，中国研究（就像繁荣的中国商务一样）将面对更多的机遇，我做了正确的选择。现在，我用Tung (2005)建议的如何选择研究主题的六个问题来解释我事业中关键的战略选择（见表1）。那时，我的探索过程本身虽然并不系统，还是涉及了这六个方面。

表 1 为何选择中国战略研究？回答 Tung (2005) 的六个问题

问 题	回 答
1. 对未来的理论和实践有广泛意义的重要趋势是什么？	振兴的中国经济作为全球经济更加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我们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2. 这个主题是否能持续较长时间，而非风靡一时的风尚？	从 90 年代末以来，这个主题显得可以长期研究
3. 这个主题是否足够广泛，能吸引大批学者的兴趣？	从小部分热衷于此的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本来对中国不感兴趣的学者也开始产生了兴趣
4. 迄今为止，这个主题受到了多大的研究关注？	尽管关注在持续上升，但总体而言这个主题没有受到大量关注（由于该领域的历史忽视），所以也为理论贡献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5. 在这个领域我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除了我是中国血统（现在这在我们领域已不再稀有）之外，90 年代我的早期研究使我具有先动优势（这是相对稀有的）
6. 我真的热衷于这个主题吗？	是的

资料来源：来自 R. Tung 的问题，“New Era, New Realities: Musings on a New Research Agenda...from an Old Timer”，*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 (this issue). Cited with the Author's Permission.

四、我最近的中国研究和非中国研究

我做完始于博士研究阶段的项目之后，开始计划 20 世纪 90 年代末新一轮的中国研究。幸运的是，我在恰当的时间又在恰当的地方工作。在夏威夷大学，我遇到了 Oded Shenkar 和 Yadong Luo，我与他们合作了四篇文章。在香港中文大学，我遇到了 David Ahlstrom, Kevin Au, Yuan Lu, Denis Wang 和 Michael Young。我们的合作产生了五篇论文。除了和本学院的同事合作之外，我还与两名志同道合的中国学者，即 Chao Chen (Rutgers) 和 Justin Tan (Creighton) 合作，写了四篇论文。最后，自从 1999 年 1 月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以来，我已经吸引了一群有天赋的博士生，Yi Jiang, Seung-Hyun Lee (现在 UT Dallas), Tony Tong (现在 SUNY Buffalo) 和 Qi Zhou。迄今为止，我和我的博士生合作了五篇文章。总体说来，这些合作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的新论文，而且带来了非常有益的友谊。

自从毕业以来，我一直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当我探究一个新主题时，通常先写一篇理论文章（例如：Peng & Heath, 1996），然后从事定性的案例研究（例如：Peng, 1997），最后是一些更系统的定量研究（例如：Peng & Luo, 2000）。除了这种线性的研究推进，我还写书支持论文中的观点，或者在邻近领域（在地理位置上而言）撰写大量新的期刊文章。通过这些活动，我接触了文献中的多条路径，同时向我的合作者学习，他们经常是我的灵感来源。所以，我开始新一轮的理论构建（例如：Chen, Peng & Saporito, 2000; Peng, 2003; Young et al., 2002），这将激活下一轮的实证研究。这种研究战略，在计划阶段是线性的，而在实际实施阶段就变得杂乱了。其主要原因是：①需要协调多位合作者的关注点和时间安排；②灵活地探究一些以前不知道数据的兴趣；③不同期刊多轮评审（以及延期和拒绝）的现实。不管怎样，我相信有计划、有系统的努力在追踪研究潮流、产生影响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主题选择方面，我一直认为要使中国研究被主流期刊接受，选择主流论题时采用中国视角是必要的。换言之，论题如果过于中国化，则通常不会引起期刊编辑和审稿人员的足够兴趣。正如上文所述，我开始中国研究时关注企业成长（Peng, 1994, 1997; Peng & Heath, 1996），而企业成长是世界上所有类型的企业面临的中心问题（Penrose, 1959）。近来，我忙于企业成长和社会网络（Peng & Luo, 2000）、组织学习（Luo & Peng, 1999）、公司治理（Peng, 2004b）、组织冗余资产（Tan & Peng, 2003）和战略集团（Peng, Tan & Tong, 2004）的研究（见图 1 的总结）。

每个论题在理论上都是由主流文献驱动的。在我研究之前，还没有学者用中国数据研究过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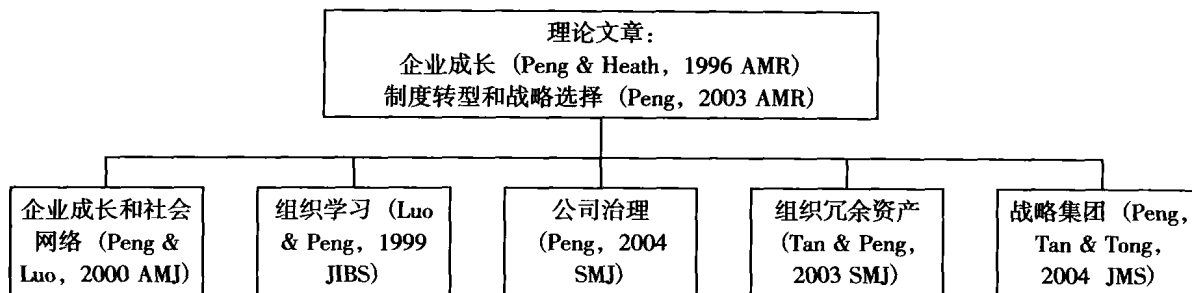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研究，主流论题

些论题。因此，通过加入中国情境，我的研究激活和丰富了关于这些论题的重要的全球性讨论，例如：①独立董事是否有助于提高财务绩效 (Peng, 2004b)；②组织冗余资产是提高还是抑制企业绩效 (Tan & Peng, 2003)；③所有权是否能用来预测战略集团成员 (Peng et al., 2004)。

由于“推”和“拉”的影响，我不仅从事中国研究，也从事非中国的研究。“推”的影响主要源于我的中国研究，我不仅努力熟悉这个领域的理论文献和中国的实际状况，而且关注其他国家的相似现象，为比较研究打下了可靠的基础。换言之，我特别想了解在世界很多地方“正在发生什么？”这推动我努力做到“多元化”。例如：我教学时常用日本的案例，这使我对日本的文献产生兴趣，最后写了一篇关于“亚洲经连会 (Keiretsu)，即日本式企业组织”的文章 (Peng, Lee & Tan, 2001b)。“拉”的影响主要源于我和世界各地同事的互动，他们读了一些我的中国研究，经常建议用他们从世界其他地方收集的数据和我一起做研究；反之亦然。

结果，我已经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研究了不同国家的多个有趣论题。除了上文提到的，我的同事还有 Garry Bruton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Trevor Buck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Igor Filatotchev (King's College London), Bob Hoskiss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Keonbeon Lee (Korea Institute of Finance), Keun Le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laus Meyer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和 Mike Wright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如图 2 所示，我研究中国香港的联合董事会 (Au, Peng & Wang, 2000)、泰国企业国际化 (Peng, Au & Wang, 2001a)、俄罗斯的私有化 (Peng, Buck & Filatotchev, 2003)、亚洲的日本经连会 (Keiretsu) 网络 (Peng, Lee & Tan, 2001b) 以及韩国的公司多元化 (Lee, Peng & Lee,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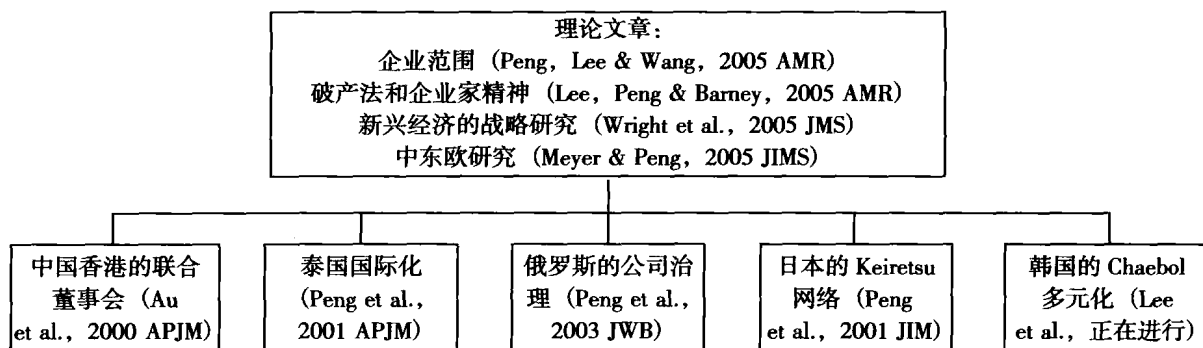


图 2 超越中国的全球化研究

与我的中国研究相比，非中国研究是没有计划的，部分因为：①我对其他国家缺乏系统的了解；②我与同事的合作通常是由合作者的兴趣和数据驱动的，所以非常有限。不管怎样，我一直利用合作的机会去激发自己新系列的理论文章，努力使自己的理论知识最大化。如图 2 所示，我最近的四篇文章中有三篇不是由我的中国研究驱动的，即 Peng, Lee & Wang (2005) 的公司多元

化, Lee, Peng & Barney (2005) 的制度和企业家精神, 以及 Meyer & Peng (2005) 的中东欧研究。相反, 这些文章是我的研究兴趣更加全球化的结果。

总体而言, 在完成始于博士时期的一系列论文之后, 我已经在过去的大约 10 年里, 寻找到多种关于中国的和非中国的研究机会。正如中国商务本身呈现的国际气息一样 (中国成为各种跨国公司的主战场), 我自己的研究也已经变得全球化。当世界最大的大学教材出版商的执行编辑、掌管顶尖战略教科书出版的 John Szilagyi 先生于 2002 年邀请我写一本名为全球战略 (*Global Strategy*) 的新教材时, 我特别振奋。他读了许多我以前的出版物 (特别是 Peng, 2000), 和很多同行商量, 并相信我是恰当人选。显然, Szilagyi 和他的同事认为我的工作已不仅是研究中国, 而且足够国际化了。就“市场”而言, 邀请一位以中国战略研究闻名的学者去写作一本新的全球战略教材预示着中国战略研究和全球战略研究的融合。现在, 我已经完成了这本新的全球战略教材 (Peng, 2006), 我衷心希望这本书将有助于推进这种融合。

五、理论贡献

正如以上所描述的, 我已经承担了多种研究项目, 一个更大、更重要的, 但是在我以前所有出版物中从未曾探讨过的问题出现了: 对理论发展的贡献是什么? 写作这篇文章给了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当更广泛地涉及亚洲管理研究时, 我赞同 Lau (2002: 171) 的评论: 虽然现在研究的数量不少, 但是“这些研究的质量还不能足以影响主流研究, 大部分在本质上是探索性的、描述性的和对比性的, 并没有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这也适用于中国研究。我是第一个承认自己的一些文章也存在 Lau (2002) 和 White (2002) 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的学者。

对于中国研究来说, 理论贡献的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受“中国例外论”(即中国在上世界上是特殊的)的心理驱动, 在国内外以及学术界内外, 对构建中国特色理论都显得很迫切 (Chen, 2002; Pye, 1992; Shenkar, 2005)。中国在上世界上特殊吗? 当然答案既“对”又“错”, 这取决于不同视角。一个更适宜的问题是: 中国是否能证明不同于主流 (即主要是西方的) 理论 (Pye, 1992)。我的答案仍然是“不”, 尽管现在 (西方) 理论通常需要在应用到中国情境的时候加以调整。用 March (2005: 10) 的话说就是: “一个为了保护其独特性而将自己与社会分离的‘传教团队’想保持自己的纯粹性, 但却发现这妨碍了自己通过信息进行社会渗透的努力。”就我们领域的中国研究依赖于整个世界并在其中发展壮大而言 (March, 2005), 中国特色理论可能在中国得到欣赏 (以及在“中国例外论”的铁杆支持者的“传教团队”内部), 但是可能不会在其他地方产生影响。用我们学科的行话说, 在理论建构方面, 尽管当“全球战略”的局限性 (原则上是一套对全世界来说最佳的理论, 事实上这些理论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 正进一步被揭示出来 (Boyacigiller & Adler, 1991; March, 2005), 一个“多国战略”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同样日本、俄罗斯、法国等也应该如此) 也不可能走得很远。在理论建构方面, 我们需要寻找难以捕捉的、却是理想的“跨国方案” (Bartlett & Ghoshal, 1989), 它结合了无情境的和有情境嵌入的因素。

在这里, 我讲述一些个人的经历。有一次, 我的一些朋友邀请我合作研究“关系理论”。“关系”经常不加注释就出现在主流媒体上 (例如, 《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家》), 我同意说关系确实已经成为最有影响的中国商务词汇。事实上, 即使我的本科生和 MBA 学生只懂一个中国词汇, 我也让他们明白关系这个词。但是, 在学术上, 我并不赞同发展“关系理论”, 这已被假定是中国特有的。其原因是在文献中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理论, 即人际网络、企业间关系或两者兼有 (Peng & Luo, 2000), 虽然不叫“关系理论”。尽管近来关系一词出现在媒体上, 但是每种文化都有一、两个描述中国所谓的关系的词汇。俄罗斯人称之为 Blat, 越南人称之为 guan he, 说英语的人称之为“old boys’ (or girls’) network”。换言之, 在主流期刊上发表一篇发展“关系理论”的文章非常困

难，主流期刊不会认为这个理论具有独特性。基于这个原因，我拒绝了朋友的提议。

该孤立事件虽然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但从事后判断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引用 Lau (2002: 177) 最近的评论还是有益的：“有必要抵制不加批评地接受所有源自亚洲的思想都是独特的，而没有对这些思想更加广泛地存在和应用加以解释的倾向”。White (2002: 296) 更加直接地指出，虽然在理论建构中使用中文词汇，例如关系，“可能在指与某些特殊情境相关的复杂现象方面是便利的，但是其危险是它们可能造成概念的偏狭，给在其他情境中看待类似现象带来认知障碍”。此外，White (2002: 306) 认为“当地术语的使用（例如：关系），会导致功能障碍，会使研究者对其他情境中的相似现象视而不见，也会产生与在此词汇相联系的地区中个人和组织的偏见。”现在回想起来，拒绝挚交好友的合作建议是非常困难的（我伤害了关系），我真希望在我向朋友们解释我的决定时能够读过并引用 Lau (2002) 和 White (2002) 的论述。

另外，我同意 Child (2000), Lau (2002), March (2005) 和 White (2002) 的观点，认为中国研究能够而且应该努力做出超越中国界限而跨越全球交错不同情境的理论贡献。“中国情境研究在阐明情境依赖方面起了作用。这有助于暴露无情境思想的局限性而反映了特定政治或文化历史” (March, 2005: 14)。我认为，中国研究除了暴露现有理论的局限性之外，已经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即将战略的制度基础理论视为“战略三角”的一个新支柱 (Peng, 2002, 2006)。在我看来，由 Peng (2002) 首次正式提出的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理论可以与传统产业理论、资源基础观并驾齐驱。产业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研 究，都假定制度是既有的，因此制度不会从“背景”中出现。在新兴经济体，例如中国，制度条件及其转变极为重要，因此要将制度放在显著位置。这也为学者们利用该情境检验现有理论、发展新的理论视角提供了机遇 (Peng, 2003, 2006)。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的战略研究一直是由产业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支撑的。其中，很大的缺失是关于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游戏的规则” (North, 1990) 对战略选择的影响。固然，很久以来，“环境”的影响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Lawrence & Lorsch, 1969)。但是，主导这种研究的主要是关注经济变量（如市场需求和技术）变化的“任务环境”观念。直到不久以前，学者们仍然很少超越任务环境去探讨制度、组织和战略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 (Oliver, 1997; Peng, 2003; Peng & Heath, 1996)。相反，基于市场的制度框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正式制度（如法律和规制）和非正式制度（如规范和认知）则被假定为“背景”条件。

现在，正如中国研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研究所证明的，这个学科更加意识到制度和组织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Boisot & Child, 1996; Peng & Heath, 1996)。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理论将制度作为自变量，关注制度和组织之间的动态互动，把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绩效视为这种互动的结果 (Peng, 2002, 2003)。具体地说，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绩效不仅由产业条件和企业能力所驱动，而且是经理们面对的具体制度框架中正式和非正式约束的反映 (Khanna & Palepu, 2000; Lee, Peng & Barney, 2005)。

换言之，制度包含比背景条件更多的东西。因而，“制度直接决定企业在制订和实施战略、创造竞争优势时应该箭射何方” (Ingram & Silverman, 2002: 20)。这个建议当然适用于发达经济。但是，诸如中国的新兴经济研究已经推动制度基础理论成为战略研究的前沿，成为战略“三角”的第三个支柱（见图 3）。这是因为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在制度框架上的巨大差异使学者们在考虑产业和资源基础因素之外，更多地关注这些制度差异 (Doh, Teegen & Mudambi, 2004; Makino, Isobe & Chan, 2004)。

在新兴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中，制度基础理论作为主导视角的兴起可以从两本颇具影响的专刊论文集中体现。2000 年，由 Hoskisson 和同行们编辑的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 专刊的 13 篇文章中有 7 篇（54%）主要是基于制度理论的研究。因此，Hoskisson 和同行们认为在

探究新兴经济时，制度理论应被视为三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另外两个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

但是，Hoskisson 和同行们（2006：263）预言制度理论的重要性可能随着新兴经济的逐步发展而下降。对此，我并不赞同。有趣的是，被越来越多应用制度基础理论解决新兴经济战略问题的研究否定了 Hoskisson 和同行们的预言。在他们做出这个预言的五年后，由曾参与 *AMJ* 专刊的两位编辑和两位新编辑（Wright et al., 2005）所编辑的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JMS*) 专刊，八篇文章中有七篇是制度方面的论文。值得指出的是，关于新兴经济研究的 *AMJ* 和 *JMS* 专刊并没有任何特别的理论视角的偏好。大部分战略学者不会将自己视为“制度理论家”（就像制度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那样）的核心力量。相反，对战略研究者而言，有丰富而多样的理论工具可以选择，他们通常利用最相关、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去解决手头的理论和实证问题（而不会成为任何特定学派的奴隶）。当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兴经济（如中国的竞争）时，制度理论成为最常用的理论工具的事实对这一视角的特殊作用是富有意义的。由于战略三角的第三个支柱的出现，这样的研究反过来又对超越新兴经济具体研究的更广泛的领域做出了贡献（Peng,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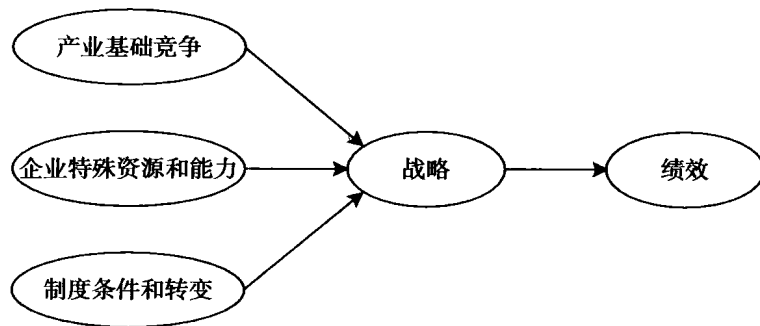


图3 制度基础理论：战略三角的第三条腿

资料来源：M. W. Peng, *Global Strategy* (p. 15). Cincinnati: Thomson South-Western, 2006.

六、结束语：现在中国就是商务

21 世纪初，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吸收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对各种跨国企业来说，20 年前进入中国是一种冒险经历，但是现在没有中国因素才是危险的。就我们学科向往成为“适宜的”学科而言，类似的转变也发生了。曾几何时，可以将所有在主流期刊上发表的中国论文进行回顾，因为这样的论文很少（Peng et al., 2001c）。现在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研究的数量与日俱增（White, 2002）。不久前，中国还被视为与我们学科的基本问题研究毫不相关的外来地方。现在，我们学科要研究的最基本问题，如“什么决定了企业在国际上的成功和失败？”（Peng, 2004a）其很多答案将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竞争的中国和外国企业中找到（例如来自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如果我们的学科想真正成为全球的组织科学，21 世纪的确有可能成为“中国世纪”（Shenkar, 2005），今后必须有更多的研究去关注中国（March, 2005; Tsui et al., 2005; Tung, 2005）。

虽然，我认为中国战略研究能为全球战略研究做出更多贡献，但我赞同 Lau（2002：174）的观点，他对更广泛的亚洲管理研究评论道：“目前所做的工作是不够的”。尽管中国研究的数量增加了，但这些研究本质上大都是简单的实证比较研究，缺乏对理论的发展，也缺少超越对中国持有特殊兴趣读者之外的概念性文献的贡献（White, 2002）。我们学科从相对敌视中国到更加重视中国的转变是值得庆祝的事，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问自己三个带有挑战的问题：

- （1）中国研究的成果被从事中国和亚洲研究之外的人引用吗？

(2) 中国研究被战略、组织和国际商务方面的主流教材引用吗?

(3) 中国学者能否以无情境的理论构建为目标而不仅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或是用别处发展的理论进行简单的验证?

我相信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理论可能成为全球战略文献的必要组成部分 (Peng, 2006)。同时,我也相信中国研究的其他领域也有这样的潜力。

再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即“如何在全球科学研究这个共同体中引导和发表中国研究呢?”我对此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我相信深入中国实际,并努力保持全球相关性的战略研究是值得的。作为中介步骤,将中国研究与更广阔的亚洲情境联系起来是有益的 (Ahlstrom & Bruton, 2004; Delios & Singh, 2005; Lau, 2002; White, 2002)。这与很多中国(和亚洲)企业的国际化扩张战略一样,通常先扩展到邻近国家。总而言之,如果本文能引发更多关于如何利用中国研究的黄金时期将中国研究与全球战略研究相融合的讨论和辩论的话,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最后,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自己的经历以及我对其他学者工作的理解,那就是我建议研究者们“行动本土化(关注中国),思维全球化”。

[参考文献]

- [1] A. Delios and K. Singh. *Strategy for Success in Asia*. Wiley: Singapore, 2005
- [2] A. Thomas, O. Shenkar, and L. Clarke. The Globalization of Our Mental Maps: Evaluating the Geographic Scope of *JIBS* Covera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4 (25): 675-686
- [3] A. Tsui, Y. Bian, J. Child, J. Galaskiewicz, Y. Luo, M. Meyer, and M. Morri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s in China: Expanding the Frontier of Global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5 (1): 1-4
- [4] C. Chen, M.W. Peng, and P. Saporito.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Opportunis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28): 567-583
- [5] C. Hill. National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zing,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Case of Japan.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5 (6): 119-131
- [6] C. Oliver.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and Resource-based View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 679-713
- [7] C.M. Lau. Asian Management Research: Frontiers and Challeng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 171-178
- [8] D.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0
- [9] E. Penrose. *A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Wiley: New York, 1959
- [10] Ghoshal. *Managing Across Borders: The Transnational Solu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1989
- [11] J. Child. Theorizing about Organizations Cross-nationally.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Management*, 2000 (13): 27-75
- [12] J. Doh, H. Teegen, and R. Mudumbi. Balancing Private and State Ownership in Emerging Markets'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Country, Industry, and Firm Influe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35): 233-250
- [13] J. March. Parochialism in the Evolution of a Research Community: The Case of Organization Studie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5 (1): 5-22
- [14] J. Tan and M.W. Peng.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Firm Performance: Two Studies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 1249-1263
- [15] J. Tan and R. Litschert. Environment-strategy Relationship and its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Electronics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15): 1-20
- [16] J.T. Li and A. Tsui. A Citation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Context: 1984-1999.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 87-107